

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



宝琛文库
BAOCHEN LIBRARY

王珂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

王珂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 / 王珂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0

ISBN 978-7-5426-3710-9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新诗—诗歌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I 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6000 号

新时期三十年新诗得失论

著 者 / 王 珂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特约编辑 / 张大伟

装帧设计 / 乔晓辰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喻 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420 千字

印 张 / 24.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710-9/I·554

定 价 / 48.00 元

绪论 新诗三十年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

诗的起源与命名决定了新诗是一种偏激的文体,它的先锋性、动态性文体特征导致得失共存。30 年来的新诗主要有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促进了思想解放,发展了汉语诗歌,优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情感,记录了国人生活;职能单一,文体极端,诗人严重缺乏学养,做人浮躁偏激,诗坛拉帮结派炒作风太盛。目前应该加强三方面的建设:以艺术方式加强标准建设,以改良方式加强诗体建设,以多元方式加强社会化写作。30 年来的先锋诗颇能呈现新诗为中国思想解放所做的贡献,很多诗人争做诗意的先锋而非诗艺的先锋。诗人的“纯文学”写作同样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

新诗是在旧诗的阴影下,在新旧诗人的双重指责声中成长起来的抒情文体,在诞生之日就饱受争议。最近 30 年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 30 年,新诗也取得了较大成绩,如诗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甚至自告奋勇地当上了中国思想解放及文化变革的急先锋。最近 30 年是中国文化大转型期,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新诗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甚至是致命的,出现了新诗的“文体合法性”危机和新诗诗人的“公信度”危机。不仅“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新诗向何处去”是近年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还出现了公众全盘否定新诗的思潮。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新诗。

如果把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算成“新诗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新诗就有百年历史。如果把胡适等人的“白话诗运动”视为“新诗”的草创期,新诗就有 90 年历史。新诗一直重视“新精神”。胡适 1925 年 9 月 25 日在武昌大学演讲时说:“新文学固然是改革形式,内容尤应特别注意,不能说形式上解放了,便一切都会跟着好。要解放形式的缘故,是拿这种解放的形式去欢迎新内容与新精神。”^①宗白华在 1941 年 11 月 10 日《时事新报》发表的《欢欣的回忆和祝贺》中指出:“白话诗运动不只是代表一个文学技术上的改变,实是象征着一个新世界

^① 胡适:《新文学的意义》,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5—256 页。

观,新生命情调,新生活意识寻找它的新的表现方式。……白话诗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大胆、最冒险、最缺乏凭藉,最艰难的工作,它的成就不能超过文学上其他部门原是不足怪的。”^①新诗是一种既追求形式变革,也追求内容更新的先锋性、动态性文体。韦勒克说:“文学的种类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名称,它是一种能够在—件作品中参与显示其特点的美学惯例。”^②文学种类的命名十分重要,如用“新诗”—词指称这种文体类型,就赋予新诗诗人在内容和形式上标新立异的权利。“新诗”—词在黄遵宪等人的“诗界革命”中就出现了。在胡适等人的“白话诗运动”中,“新诗”—词常常用来指称“白话诗”,但是两者有细微差别,“白话诗”强调“白话”,“新诗”强调“诗”。随着白话诗的诗性越来越浓,“白话新诗”—词出现,指称“用白话写的新诗”。再后来,随着白话越来越成熟,完全取代了文言,白话诗也越来越多地借鉴了外国诗和中国古诗的诗体方式和写作方式,“白话”—词很快隐退,“新诗”成了这种类型的诗歌的主要称谓。

简要回顾这种文类的发端及命名,是想说明它的先锋性、动态性文体特征使新诗得失共存。中国的20世纪是动荡的时代,革命、运动、改革此起彼伏,“破坏”是时代的主旋律,直到20世纪后期才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时代,“建设”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诗生态的动荡决定了新诗文体的混乱。新诗的数量是惊人的。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收入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但是数量并不能说明质量,近年很多人认为新诗存在很多问题。2002年郑敏说:“中国新诗很像一条断流的大河,汹涌澎湃的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悲的是这是人工的断流。将近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同时口语与古典文字也失去了共融的可能,也可以说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③1988年梁实秋说:“我以为新诗如有出路,应该是于模拟外国诗之外还要向旧诗学习,至少应该学习那‘审音协律敷辞悱藻’的功夫。”^④1999年钱理群说:“和充分成熟与定形的传统(旧)诗词不同,新诗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成型’、尚在实验中的文体。因此,坚持新诗的创作,必须不断地注入新的创造活力与想象力;创造力稍有不足,就很有可能回到有着成熟的创作模式、对本有旧学基础的早期新诗诗人更是驾

①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43页。

② René Wellek,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Inc., 1956. p. 214.

③ 郑敏:《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诗探索》2002年第3—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④ 梁实秋:《“五四”与文艺》,徐静波:《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轻就熟了的旧诗词的创作那里去。”^①

新诗文体的先锋性、动态性和实验性导致新诗新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出现了诗人与普通读者的严重对抗。2006年5月钱理群说:“我对当代中国诗歌几乎是一无所知,坦白地说,我已经20年不读、不谈当代诗歌了,原因很简单,我读不懂了。”^②国人对新诗的责难甚至敌视情绪在2006年秋天大爆发,发生了“网友恶搞新诗诗人及新诗”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该报记者李舫的文章《谁在折断新诗的翅膀?》。新诗的翅膀确实受了伤,但是没有被折断。仅以诗歌刊物为例,20世纪80年代办的十多家诗歌刊物,停办的只有《当代诗歌》、《诗人》、《大河》等少数几家,《诗刊》、《诗潮》、《诗歌月刊》等诗刊还由月刊变成了半月刊,《星星》还推出了理论版。新诗研究的理论刊物《诗探索》越办越好,还出现了《新诗评论》等学术刊物。网络带来了新诗的新繁荣,涌现了“诗生活”、“诗江湖”、“界限”等数十家有影响的诗歌网站,出现了上千家诗人博客。仍然有很多人写新诗,特别是遇到重大事件时,如5·12汶川大地震后,很多人都提起了诗笔。

新诗参与了中国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加快了民主进程。这是新诗30年来的最大成就。胡适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的讲演中说:“其时由一群北大教授领导的新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领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也知道为获得自己所需,他们必须破坏什么。他们需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③在这次“文艺复兴运动”中,新文学是文艺的先锋,新诗是文学的先锋。新诗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产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实质上是声势浩大的“经济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新诗又自觉地承担起胡适所言的那些使命,并较好地完成了那些使命,创造出了胡适所言的“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以及新的学术”。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岛、舒婷等诗人把新诗参与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的济世传统发扬光大,成了思想解放的“报春鸟”。在《今天》创刊30周年之际,北岛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今天》是一个纯文学杂志但很多人还是会把它跟政治联系到一起”等问题时说:“所谓‘纯文学’只在当时的语境中有意义,那是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提出‘纯文学’就是一种对

① 钱理群:《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诗探索》1999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② 钱理群:《诗学背后的人学——读〈中国低诗歌〉》,张嘉谚:《中国低诗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耿云志:《胡适论争集》,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9—1630页。

政治的反抗。……当时《诗刊》的副主编邵燕祥是我的朋友，他把《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分别发在《诗刊》1979年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上。《诗刊》当时发行量很大，超过上百万份，……《今天》的出现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那是精神的能量，语言的能量。这和精神与语言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有关。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转折期，诗歌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负担。诗人甚至一度扮演了类似如今歌星的角色，那也是反常的现象。直到1985年，特别是1989年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中国，诗歌重新边缘化。这一高潮的尾声是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叶文福、舒婷、杨炼、顾城和我都去了。叶文福最受欢迎，他写的是政治讽刺诗，有意义，……他在舞台上朗诵时，听众中居然有人高喊‘叶文福万岁’。他真的可以发动一场革命，……那是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在那样的语境中，提出‘纯文学’就是一种对政治的反抗。”^①北岛的回忆一点也没有夸大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诗在政治生活中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民主自由“鼓与呼”的巨大力量。他说得不准确的是，那时的诗人扮演的不只是为人民抒发感情的“歌星的角色”，更多是为人民代言的“政治明星的角色”。那是政治抒情诗流行的时代，如很多诗人写诗悼念被专制扼杀的张志新烈士。雷抒雁写了长诗《小草在歌唱》，韩翰写了小诗《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曲有源的《无题》说出了很多诗人的诗歌观：“……我的诗呵，是水，/喜欢压力和阻拦；在阻拦的礁石前溅起浪花，/在压力的地底下涌作美泉！”在80年代除政治抒情诗外，还流行政治讽刺诗，刘征、石河、陈显荣、张维芳等人专门写讽刺诗。

尽管北岛认为《今天》是纯文学杂志，但是发表在民刊《今天》上的诗作产生的“政治力量”在当时是巨大的，他们的“纯文学”写作同样具有政治抒情诗写作的启蒙力量，甚至具有更神奇的政治革命的潜能。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要是表示了一种风格上或技巧上的根本变革，它可能就是革命的。这种变革可能是一个真正先锋派的成就，它预示了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实际变革。”^②北岛、舒婷、顾城等人不仅扮演了新诗先锋的角色，更承担了思想先锋的历史使命。正如舒婷的丈夫陈仲义所言：“以《今天》为发端的朦胧诗潮，酿成了新诗史上令人瞩目的一次诗运，……它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属于文革痛定思痛的产物，而绝不是全盘西化的‘舶来品’。正是这一群早熟的觉醒者，对文化专制残余的抗争，对外来文化的大胆吸纳，才能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迅速冒出令人震颤的‘井喷’。”^③甚

① 北岛：《靠“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读书·凤凰网站。http://book.ifeng.com/psl/zjdt/200901/0119_3552_976072.shtml。

② [美]赫·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③ 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至到了今天,新诗的生态及诗人的生存环境与30年前颇异,中国已经进入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相对平稳时期,诗坛仍然存在90年代风行的个人化写作,文艺的娱乐功能受到高度重视,很多人的写作和阅读都是为了获得快感,诗人的生态有点像王家新1990年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中的两句诗所言:“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新诗的功能和国人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北岛、徐敬亚时代的那批诗人仍然高度重视诗的启蒙功能。“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岛总结道:‘《今天》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①

“任何价值系统都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很明显,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存在于通过转移而被重新构建的境况之中。”^②30年来的先锋诗颇能呈现出新诗为中国思想解放所做的贡献。它经历了由诗意的先锋到不彻底的诗艺的先锋,再转向诗意的先锋三大历程。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是先锋诗的草创期,以民刊《今天》集结的“今天诗派”为代表。他们既是诗艺的先锋,如他们不愿意采用当时流行的新诗形式,而愿意用十分散文化的自由诗取代强调音乐美和排列美的新格律诗。但是他们更多是诗意的先锋,更重视人的解放而不是诗的解放。即使追求诗的解放,也是试图通过诗的解放来达到人的解放。如徐敬亚写于1980年末到1981年初,发表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的《崛起的诗群》所言:“自由化,是新诗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脚步。……至于格律,将来是一定如同茧子一样要形成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目前的创新在于突破!在于尽可能丰富地展现!……这种自由式当然更适于各种复杂情绪。”^③孙绍振写于1980年10月21日至1981年1月21日,发表于《诗刊》1981年第3期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说:“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褻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的空话。”^④谢冕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说:“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⑤其实并

① 刘瀛:《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今天》文学杂志网站 <http://www.jintian.net/today/?viewnews-3245>,2009-02-06。

② Judith Williams. Decoding Advertisements. London: Robert MACle hose and Company Limited, 1978. p. 43.

③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1980年中国诗的现代倾向》,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页。

④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社:《中国新时期争鸣诗精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页。

⑤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下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255页。

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把诗写得通俗易懂,而是采用朦胧的手段来表现“过多的哀愁”和“偏颇的激愤”,功能决定文体,题材制约体裁。当时反对朦胧诗的很多人,特别是那些诗评家完全有能力读懂那些诗。有的诗评家确实是出于艺术目的反对激进改革,特别是吸取了新诗60年来的变革总是多“破”少“立”,严重影响了新诗健康发展的教训,想用改良的手段取代革命,提出新诗要稳健甚至中庸地发展。有的是出于对有些朦胧诗诗人醉翁之意不在“诗”而在“思”的反感,认为这有害于纯诗艺术的发展。反对朦胧诗最严厉者是那些害怕偏激的诗歌运动带来思想运动甚至政治革命的人。孙绍振、谢冕等诗评家也是既从艺术变革也从思想解放角度支持朦胧诗的。当时海外华语诗人都认为朦胧诗并不朦胧。叶维廉说:“所谓‘朦胧’,所谓‘难懂’,对大陆以外一般的读者而言,根本不存在。这些诗被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用了多重意义多重指涉的意象和隐喻。……在大陆,长久以来,作者、读者一再走向一种观察现实的方式,走向一种表达现实的方式。”^①新诗长期形成的现实主义手法严重妨碍着朦胧诗诗人进行深入纯粹的诗艺探索,现实使他们不可能进行象牙塔中的文体实验,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纯文学写作。即使进行的是纯文学写作,也很容易被误读为政治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到各行各业,新诗界也掀起了改革浪潮,“实验诗”几乎是“先锋诗”的代名词,青年诗人都致力于实验诗的写作,甚至中年诗人昌耀也于1988年12月12日写出了将诗与散文诗合为一体的文体创新之作《内陆高迢》,其中一个句子长达163个字。《当代诗歌》等官方刊物也开辟了“新潮诗”专栏,如在1987年1月号以《非非主义诗作选(新潮诗)》为题发表了周伦佑的《埃及麦子》和杨黎的《中国鱼》等诗。从这些诗的题目就不难看出声称进行纯粹的新诗改革的“非非主义”诗人的“介入”意识。民刊《他们》也是这一时期先锋诗的重要刊物,1985年在南京创刊,截至1995年,一共出了9辑,集结了多位先锋诗人,如于坚、韩东、丁当、杨克、吕德安、唐欣、小海等。“韩东是这份刊物实际上的主编和‘灵魂’人物,他对诗歌的理解和个人趣味对刊物有很大的影响。”^②《他们》强调艺术的创新,强调诗对日常生活的“介入”,通过“小我”来呈现“大我”。尽精微,致远大。在90年代,于坚、伊沙等很多诗人都强调诗要说人话,要求诗人关注“当下生活”。“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这句话成为很多诗人的座右铭。他们推崇平民化写作,把诗艺的高空飞翔调整为诗意的低空巡行。诗坛出现了诗意的激进与诗艺的保守、思想的深刻与艺术的粗浅相互依存的奇特现象。只有极少数诗人当诗艺的先锋,追求“纯诗”,重视诗的技巧与风

① [美]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3—274页。

② 小海、杨克:《〈他们〉十年诗歌选》,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格的创新。因此 90 年代的先锋更多是本土化和世俗化了的现实的平民的先锋,先锋诗人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情怀常常多于文体意识和审美情趣。诗的题材上的“轻化”和诗歌写作上的“个人化”甚至私语化是 90 年代诗歌的重要特色。“人的自我意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①“认识自我不是被看成为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它不仅仅是好奇心或思辨的问题了,而是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②个人化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继承了新诗百年来一直存在的追求自由的传统,还有助于摆脱独断性的意识形态及一元化的群体意识或社会秩序感对个体意识和个体自由欲的残酷压迫,有助于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新诗作为独特的抒情文类的价值,个人化写作呈现出的写作方式的多元及写作上的民主,也可以象征国人生活方式的多元和政治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民主改革。

新诗还有四大成就:一、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特别是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现代汉语诗歌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中期十分萧条,几乎没有真正优秀的诗人和诗作。最近 30 年涌现了大量优秀诗人和诗作,可谓英才辈出。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现了诗人“三世同堂”现象,老诗人有艾青、郑敏、牛汉、屠岸、陈敬容等,中年诗人有昌耀、杨牧、刘湛秋、李瑛等,青年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傅天琳、李钢等。在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王家新、于坚、韩东、李亚伟、翟永明……在 90 年代初中期涌现了海子、骆一禾、西川、臧棣、西渡、唐欣、伊沙、王久辛……21 世纪网络诗歌兴起,更是诗人涌现的时代。还涌现出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新诗,如口语诗、新格律诗、意象诗、自白诗、图像诗、十四行诗、小诗、长诗等都有人专门写作。二、新诗优美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更富有文采和诗意。尤其是在现代汉语的精致优美上,新诗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当年进行文学革命及新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文学的国语”:“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③在今天,不难发现胡适通过文学来改造语言的目的基本达到了。“诗人有对文字的敏感性,……诗人又具有那种能使诗歌即便在翻译成外文之后也仍然优美动听的能力。他还有对语言的不同功能(其便于朗诵的特征,其说服力、激发力、传达信息或使人愉快的力量)的敏

① Denys Thompson. *The Uses of Poe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

②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 页。

③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8 页。

感性。”^①中国是历史悠久的诗国,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为诗人的语言创造提供了方便,他们创造出大量含蓄优美的语言,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颁奖辞”就诗意十足。在普通人的情书上,甚至在求职书上,都可以读到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成为房地产广告常用的广告语。新诗进入了教科书,新诗的语言也对学生的语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诗还通过被朗诵和被阅读等方式广为传播,如中央电视台的“新年新诗会”有大量受众。电子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媒体也为新诗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更有机会影响人们的语言方式。新诗还为小说、散文等文体提供了优美含蓄的语言。很多散文家、小说家走上文学道路都是从写新诗开始的,还出现了“诗体小说”和“诗体散文”。三、新诗丰富了国人的情感,特别是丰富了普通人的情感,使他们的生活更有诗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本国策极大地调动了国人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刺激了国人的竞争意识,也增加了国人的生存压力,生活节奏加快,导致一些人情感淡漠,想象力匮乏,“诗意地栖居”是很多人的梦想。新诗让一些人实现了这个梦想。1986年大学毕业后自愿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的阿信曾在诗中感叹现实生活的无奈:“我们无法安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无法安慰我们”。写诗却给他带来了令人羡慕的草原隐士般的宁静生活,他还成为了著名的草原诗人,2008年出版的诗集《阿信的诗》受到好评。近年打工诗歌流行正是因为打工者想用诗来抒发感情、记录生活,想通过写诗来获得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诗意的生活”。新诗既是精英的先锋性文体,也是大众的世俗性文体,读诗与写诗都有利于国人的身心健康。无论是80年代“社会化写作”产生的黄钟大吕式诗作,还是90年代“个人化写作”产生的微风细雨式诗作,都可以给普通人带来慰藉,增强人的生存信心。近30年是中国流行歌曲大繁荣的时代,严格地说,歌词作者,特别是流行歌曲的作词者也是诗人,有的还是优秀诗人。近30年出现歌词写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导致诗人与歌词作者分离现象。但是由于在80年代出现了“全民写诗”般的繁荣,很多歌词作者都曾经写过新诗。如果说流行歌曲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情感,安慰了国人的生活,新诗也有一份功劳。四、新诗记录了国人的生活,展示出国人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如近年流行的“打工诗歌”真实地呈现出“打工者”的生存境遇,出现了郑小琼等打工诗人。在80年代初中期就有诗人关注个人的日常生活,如李亚伟写了《中文系》、于坚写了《尚义街六号》;在90年代“生活流”诗歌更受重视,如杨克所言:“90年代以降,我的诗歌写作大略可分为一大一小两个板块,其主要部分我将它

^① [美]H. 加登纳:《智能的结构》,兰金仁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们命名为‘告知当下存在本相’的诗歌,从人的生存和时代语境的夹角楔入,进而展开较为开阔的此岸叙事,让一味戏剧化地悬在所谓‘高度’中的乌托邦似的精神高蹈回到人间的真实风景中,从另一种意义上重新开始对彼岸价值的追寻。另一类是艺术上的有意‘怀旧’之作,力图在热衷于标新立异的今天,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守护几千年来诗之所以成其为诗的那些因素。……作为一个持民主自由多元观念的现代人,我不反对大众,也向往优裕的生活,物质和商品在我的视觉里只是一个个中性元素。”^①杨克在广州写了《杨克的当下状态》等记录都市生活的诗。还有一些诗人记录社会生活,如读严力、徐敬亚、王小妮、王家新、王久辛、朵渔、伊沙、谢宜兴、汤养宗、陈衍强、王明韵、郑小琼、周瑟瑟、侯马等人写的震灾诗就可以知道汶川大地震给国人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如王明韵 2008 年 5 月 25 日写的《成都火车东站西线 12 库》记录了诗人的志愿者行动:“如果不是汶川大地震/我即使走错路,也不会来这里/成都火车东站、西线、12 库/我们一群志愿者、写诗的人/来这里搬运麻袋和纸箱/搬运大米和食盐……”

尽管 30 年来的新诗成绩显著,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有的甚至与成绩共存,如社会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和先锋写作都有利也有弊,也可以总结出五大问题:一、职能单一,过分强调实用。前十年过分重视使命意识,社会化写作流行;后十年过分重视生命意识,个人化写作流行。二、文体极端,过分强调写作自由。功能的单一导致了文体的单调和诗艺的粗糙,导致新诗写作缺乏必要的难度和高度。写诗必须过诗的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一些诗人甚至没有过语言关。“新诗是最好写的文体”、“新诗不需要教和学”、“新诗写作不需要修改”等观点泛滥。三、诗人严重缺乏学养与诗歌修养,缺乏诗体意识、经典意识和学习意识,过分与前人的优秀诗歌,特别是古代汉诗断裂,“弑父式”写作流行。很多诗人都缺乏古代汉诗诗人的基本功——推敲之功。很多诗人不知道西方十四行诗是定型的诗体及其文体特征和写作方法,只将诗写成 14 行。四、诗人做人浮躁偏激。诗人不但受到中国古代诗人风流倜傥、自命清高等生活方式的影响,还受到外国诗人,特别是浪漫主义诗人自命不凡,甚至把“浪漫”与“革命”等同的做人方式的影响,把浪漫主义精神片面理解为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过分强调自我表现和个人自由。一些诗人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五、诗人拉帮结派,内耗严重,炒作风太盛。近年中国进入广告时代,一些青年诗人本末倒置地致力于“诗外功夫”,不择手段炒作自己:办诗社、诗报、诗刊或诗歌网站充当领袖,争当某种新术语或新理论的发明者,争当诗刊、诗选的总编,主动

^① 杨克:《对城市符码的解读与命名——关于〈电话〉及其他》,汪剑钊:《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0—121 页。

请名人,特别是著名诗评家为自己写评论,甚至写文章自我吹捧。近年真正潜心写作的诗人却很难获得公正评价。新诗史家洪子诚在2005年10月上海举行的“诗意城市:上海先锋诗歌研讨会”上说:“上海诗人个性都比较强,都有点自负,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拉帮结派’,而且也拒绝对他们的作品作就像我现在所作的对他们进行整体性的概括,但是在当代中国以运动为主要特征的诗歌环境里头,他们的名声也因此受到损害,影响力也受到一些削弱。”^①在30年来的中国诗坛,特别是在近年的青年诗坛,新诗的艺术之争常常变味为帮派之间、小圈子之间的“话语权之争”。一些诗人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诗作而是依靠“诗歌运动”爆得大名。近年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几起利用媒体恶意炒作的“诗歌事件”。这些“诗歌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新诗和新诗诗人的声誉。

^① 谢冕、洪子诚、徐敬亚、杨剑龙:《先锋诗歌:一代不如一代》,《社会科学报》2005年1月13日第6版。

目录

绪论 新诗三十年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 / 1

第一章 新诗诗体研究 / 1

- 第一节 新诗诗体建设构建方针 / 2
- 第二节 新诗诗体建设构建策略 / 15
- 第三节 诗体的“伪话题”之争 / 41

第二章 新诗技法研究 / 56

- 第一节 新诗应该重视技法 / 56
- 第二节 新诗应该建立标准 / 58
- 第三节 男性诗歌写作技法 / 72
- 第四节 女性诗歌写作技法 / 99

第三章 新诗功能研究 / 117

- 第一节 新诗与政治 / 118
- 第二节 震灾诗写作 / 143
- 第三节 中年诗人写作 / 176
- 第四节 木斧书信诗写作 / 179

第四章 新诗生态研究 / 200

- 第一节 八九十年代先锋诗 / 201
- 第二节 梨花体羊羔体事件 / 212
- 第三节 网络诗博客诗 / 230
- 第四节 新诗与地域文化 / 238

- 第五节 校园诗的关键词 / 245
- 第六节 新媒体诗人形象 / 252
- 第七节 今天如何做诗评家 / 259
- 第八节 席慕容回应尖锐批评的启示 / 265

第五章 新诗田园调查 / 276

- 第一节 讲座录音 / 276
 - 一、安徽农业大学《新诗欣赏与诗歌疗法》讲座 / 276
 - 二、福建师范大学《如何做新诗研究》讲座 / 297
- 第二节 诗会录音 / 315
 - 一、“21 世纪汉语新诗走向”九龙湖诗会发言 / 315
 - 二、“朦胧诗 30 周年”第三届鼓浪屿诗歌节发言 / 319
- 第三节 采访录音 / 323
 - 一、与周仲器教授周渡博士谈诗录音 / 323
 - 二、与安徽诗人龙羽生谈诗录音 / 338
- 第四节 如何克服诗的冲动性写作博客论争实录 / 352

结语 新诗应该重视相对标准、常规诗体和社会化写作 / 368

参考文献 / 371

后记 把事情真相告诉大家 / 379

第一章 新诗诗体研究

文体的生成是错综复杂的,一种文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代文人、一段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或“象征”。诗体是对诗的属性的制度化的具体呈现,指诗歌作品的语言秩序及语言体式。诗体主要包括语言的韵律形式和语言的排列形式。狭义的诗体指一首诗的外在形体及表征,主要指包括诗的音乐形式和诗的视觉形式的诗的形式规范及诗的体式;广义的诗体指在诗家族中按形体特征划分的个别具体类型,甚至还可以用诗体来指称某位诗人在诗的句法、文法上形成的风格。诗是最讲究“体”的文体,外国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都形成了相对定型的诗体,甚至形成了定型诗体,如西方诗歌的十四行诗和古代汉语诗歌中的格律诗。西方自由诗也讲究一定的韵律。“自由诗是没有韵律和缺乏一个有规律的诗律的统一的诗,自由诗不是形体上的自由。但是,事实上,可以说自由诗没有外部的整齐的设置也能够赋予内部结构充分的范围。”^①“自由诗(‘free’ verse)不是简单地反对韵律,而是追求散体与韵体的和谐而生的独立韵律。如果意识不到这样的‘第三种韵律’(third rhythm),就无法解释诗失去规则韵律为何不会沦为散文。”^②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产生于特殊时代,是在“诗体大解放”的口号中诞生的。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就是诗体问题。诗体不仅具有诗学意义和写作学意义,还具有政治学和伦理学价值。“只有既尊重文体的民主政治和人的自由天性,又重视文体的相对稳定性和人在后天文化中建立起的秩序感,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诗体生态环境,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文体极端混乱与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与诗意十分缺乏的困境。”^③

① David Bergman, Daniel Mark Epstein. The Heath Guide to Literature.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 Company, 1987. p. 24.

②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72.

③ 王珂:《新诗诗体生成史论》,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425页。

第一节 新诗诗体建设构建方针

哲学意义上的本体(Ontology)通常指世界及事物的元初存在和表现形态,在不同时代本体的意义却有较大差别。在本质主义时代,“本体”与“真理”有些异曲同工,偏重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终极意义,强调名称所对应的具体事物的唯一性和个体性。在关系主义时代,本体重视名称指称的具体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重视它在公共领域中的位置,具有共享(share)性和可扩展性(Extendibility),强调多样性和团体性。现代社会的本体观已经超越单一的、静态的本质观,越来越重视“形式本体”(Formal ontology)、“混合本体”(Mixed ontology)和“表现本体”(Representational ontology),更具有巴赫金的“对话”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甚至还具有梅洛·庞蒂的“身体”的意味。因此在讨论新诗本体时,既要重视本质主义视域中的本体,重视这些约定俗成的诗歌观念:诗是最高级的语言艺术,诗是人类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诗通常是韵文;新诗是现代汉语诗歌,新诗是具有现代精神、特别是自由精神的诗歌,新诗是打破了“无韵则非诗”做诗信条的自由诗……更要重视关系主义视域中的本体,尤其要重视新诗的形式本体——多种诗体、混合本体——多种文体、表现本体——多种技法。如果按照这样的本体观确立新诗的本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诗是由多种诗体(定型诗体、准定型诗体和不定型诗体)共存、多种文体(散文、戏剧、小说、新闻)共建和多种技法(抒情、叙述、议论、戏剧化)共生的文体。还可以把这个诗的定义扩展为:“新诗包括内容(写什么)、形式(怎么写)和技法(如何写好)。内容包括抒情(情绪、情感)、叙述(感觉、感受)和议论(愿望、冥想)。形式包括语言(语体)(雅语:诗家语(陌生化语言)、书面语;俗语:口语、方言)和结构(诗体)(外在结构:句式、节式的音乐美、排列美;内在结构:语言的节奏)。技法包括想象(想象语言、情感和情节的能力)和意象(集体文化、个体自我和自然契合意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新诗观:新诗是采用抒情、叙述、议论,表现情绪、情感、感觉、感受、愿望和冥想,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汉语艺术。”^①

“质代变”是汉语诗歌的一大特色。康熙年间汪森为《词综》作的序准确地总结出古代汉诗的文体流变及本体变化:“自有诗而有长短句即寓焉,……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当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

^① 王珂:《今日新诗应该守常应变》,《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27页。